

Literati or Monks? Jokes about Buddhist Monks' Literary Identities in Northern Song *Biji*

By: [Xiao Rao](#)

Rao, Xiao. 士乎？僧乎？北宋筆記中關於佛教僧人文學身份的笑話 “Literati or Monks? Jokes about Buddhist Monks' Literary Identities in Northern Song *Biji*.” In 《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Identity and Networks: Collect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Mt. Wutai*), edited by Shi Miaojiang 釋妙江, 330-337. Taipei: Xinwenfeng 新文豐, 2019.

***© 2019 FROGBEAR.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ong literati perception of Buddhist identity through the jokes on Buddhist vegetarianism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biji* (miscellaneous jottings), an idiosyncratic genre that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 first discuss how mockery was used by literati to problematize Buddhist monks' ever deepening engagement in secular endeavors by playfully linking precept-breaking carnivorousism to monks' poetry writing. Due to the intrinsic ambiguity between enmity and friendship in playfulness, I next demonstrate how playfulness was used as a reconciliatory force i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Buddhist precepts and practice.

Keywords: *biji* | Song dynasty | Buddhist identity | humor

Article:

***Note: Full text of article below

“士乎？僧乎？北宋筆記中關於佛教僧人文學身份的笑話 (Literati or Monks? Jokes about Buddhist Monks’ Literary Identities in Northern Song *Biji*).” In 《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Identity and Networks: Collect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Mt. Wutai*). Ed. Shi Miaojiang 釋妙江. (Taipei: Xinwenfeng 新文豐, 2019), 330-337.

[A research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based on my presentation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Mt. Wutai, 2018. The revis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article is in 2019.]

Abstract in English: This article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ong literati perception of Buddhist identity through the jokes on Buddhist vegetarianism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biji* (miscellaneous jottings), an idiosyncratic genre that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 first discuss how mockery was used by literati to problematize Buddhist monks’ ever deepening engagement in secular endeavors by playfully linking precept-breaking carnivorousism to monks’ poetry writing. Due to the intrinsic ambiguity between enmity and friendship in playfulness, I next demonstrate how playfulness was used as a reconciliatory force i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Buddhist precepts and practice.

五臺山東方佛教文化研究院書系 I

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

第四屆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釋妙江 ○ 主 編

陳金華 釋寬廣 紀 賀 張書彬 ○ 副主編



士乎？僧乎？：

北宋筆記中關於佛教僧人文學身份的笑話

饒驍

一、僧人的文學身份：佛教身份觀念在宋代遇到的問題

僧人何以為僧？從宗教的視角來看，佛教拒絕一種固定的身份和自我意識。然而，身份不僅僅是自我定義的，同時也被社會其他成員所定義。對世俗而言，佛教僧人通常被稱為「出家人」。這樣一種身份標籤是被其「否定」的世界觀所定義的。除了佛教對於固定自性的拒絕，佛教對於身份的「不認同」也在於那些拒絕慾望的戒律。這些戒酒肉等的戒律形成了世俗對於佛教僧人的簡單的辨識標籤。

出家人的概念不僅僅在哲學和社會層面上，僧人也維持一種對世俗政治和文學的超然態度。但是這樣一種超然的印象卻與僧人和世俗圈的密切交往相悖。通過和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互動，僧人尋求權力和經濟的支持的同時也藉此擴大佛教在世俗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僧人與士大夫互動的一個重要方式是通過文學寫作。在佛教進入中國的最初幾個世紀，能讀會寫的僧人通常被作為佛教典籍的翻譯者和註解人而被重視。這些文本很難被當作「文學」看待，而作為士大夫核心觀念的「文」，也並未在中國佛教的早期階段中得以明確的樹立。當然早期的僧人也寫詩，與文人之間詩文贈答也非常廣泛，但是到唐代之前似乎沒有一種文學體裁可以被定義為「僧人文學」或「僧體」文學。從唐代開始，寫詩在僧人的生活和僧侶生涯中日趨重要。宋代以後，僧人與士大夫的詩歌酬唱更是非常興盛。宋代僧人不

僅留下了大量的詩作，同樣也是宋代僧人的文學寫作讓其出家人的身份產生了問題。在這個情況下，本文提出「佛教僧人的文學身份」的概念：文人文化圈中對於僧人創作的詩歌和文學作品，基於佛教與世俗差異性特質，而產生的帶有審美取向的身份標籤。僧人的文學身份和詩歌創作是本文要關注的一個核心議題。關於這個議題，近兩年在北美的漢學界有一系列研究予以關注，比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文章《佛教如何影響唐詩》；余泰明（Thomas Mazanec）的博士論文《中國佛教詩歌的發明》以及蒲聖傑（Jason Protass）的博士論文《宋代僧人的文學文化》。¹ 這些研究指向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僧人們如此深入地參與世俗的文學創作，他們作為「出家人」的身份如何面對這些矛盾和挑戰？或者，是否我們在唐宋時期看到的是另一種僧人身份的形成，這種身份建立在「接觸」而非「否定」的基礎上？

本文關注世俗士大夫如何看待僧人的文學寫作，主要材料來自于宋代筆記。本文選取的材料共同點是這些材料都有幽默性。² 幽默和笑話對於我們理解士大夫和僧人的文化和交往提供了很有意義的信息。本文借用法國哲學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觀點，側重於幽默的社會屬性。他認為：「笑需要一種共鳴……滑稽的效果與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習慣和觀念息息相關。」³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認為，幽默的成立仰賴于社會特定群體成員之間共同的預設觀念，這些預設往往是文本之外的信息。挖掘這些共享的預設觀念，並仔細考察這些材料為何對宋代讀者而言是幽默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關於宋代佛教僧人與士大夫之間

1. Jason Protass, "Buddhist Monks and Chinese Poetry,"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Stephen Owen, "How did Buddhism Matter in Tang Poetry," *T'oung Pao* 103 4-5, pp.388-406; Thomas Mazanec, "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Poetry: Poet-monks of Late Medieval China (c. 760-960 CE),"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7.

2. 本文不介入關於幽默定義及其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討論。本文所提到的「幽默」概念根據《漢語大詞典》定義：「幽默，英語 humour 譯音詞。詼諧風趣而又意味深長。」

3.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笑與滑稽》，樂愛國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文化交流的新的理解。

具體而言，本文關注佛教對於吃肉的戒律以及士大夫如何運用這一主題來討論僧人的詩歌創作。筆者認為這些語帶戲謔的討論消解了部分世俗觀念中區別僧人和士人的僵化的身份界限，同時有助於形成對於世俗士大夫與佛教觀念體系之間關係的一種更為開放的態度。

二、僧人吃肉的笑話

對世俗而言，從唐宋以來，僧人不吃肉似乎是中國佛教中僧人身份的一個重要標籤。但並非所有佛教徒都禁食肉類食物。而且，對於吃肉的觀點也受歷史和文化的因素的調節。只要不殺生，在除了中國佛教以外的很多佛教傳統中，吃肉並不會對佛教徒造成嚴重的倫理挑戰。

在中國佛教中，自梁武帝時期以來，禁吃肉的戒律成為僧侶生活的重要一環。而且筆者認為這其中世俗圈裡對於這項嚴格戒律在中國佛教僧人群體中的形成和執行有著重要影響。錢鐘書在評價梁武帝〈斷酒肉文〉的時候說到「王法替佛法張目」。⁴但與官方論述以及佛教經和律的規定往往不同的是，在筆記小說中，關於僧人破戒吃肉的記錄比比皆是。雖然這並非讓人意外，但本文希望通過北宋筆記中的笑話，考察佛教戒律與宋代僧人文學身份之關係。

首先討論兩則關於僧人吃肉破戒的笑話。通常這類笑話建立在僧人身份與吃肉之間的不協調性上。第一則例子來自北宋僧人覺范惠洪（1071-1128）的《冷齋夜話》：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攜客來游，珍亦坐於旁，

4. 錢鐘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68頁。

5. 惠洪《冷齋夜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2018年，第80頁。

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無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臥氈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⁵

在這一則筆記中，珍禪師對郡守的回答的第一層幽默在於他機智化解了他的僧人身份與他熟知羊肉味道之間的不協調性。惠洪的這一條筆記並沒有直接處理珍禪師的身份問題，而是通過郡守的突然「色變」來暗示。這裡郡守的動怒正是建立在他假設珍禪師對於羊肉味道的評論來自于禪師自己經常破戒吃羊肉的經驗。作為宋代的郡守，他處在一個權力上的權威和優勢地位來訓斥甚至懲罰一位僧人的破戒行為。筆者在前文提到中國的世俗權力對於佛教叢林的巨大影響，在這裡具體的宋代背景下，有另外一個情形或許也導致為什麼郡守會對珍禪師羊肉評論如此敏感。僧人從地方政府領取度牒來保持他們的僧人合法身份。但到宋代，政府為擴大財源開始販賣度牒，這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問題，例如有錢人可以通過購買僧人身份來免稅，但他們不是僧人。或許因為這項政策如此被濫用，這裡的郡守覺察到一絲珍禪師有悖於僧人戒律的言論後就開始質疑這是不是又是一個假和尚。

珍禪師最後的回答還有第二層的幽默。這體現在珍禪師所展現的對於言辭運用的高超技巧。他不僅巧妙地否定了對於他僧人身份的質疑，而且構建了中央做官與地方做官的政治隱喻，正契合了郡守作為一位在地方任職的士大夫的政治抱負。甚至不排除，珍禪師是故意評論羊肉味道，這一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話題來引發質疑以達到他恭維郡守的目的。這種在士大夫社交場合的高超的，即興的言語遊戲于宋代詩歌創作所推崇的即興與翻案的理念若合一契，是僧人在文藝社交圈的重要技能。

當然，關於僧人吃肉的笑話並不只停留在言語層面，也經常能激發對於「持戒」這一概念本身與佛教僧人身份本質關係的思考。下面這一則筆記來自南北宋之交的士人葉夢得（1077-1148）的《避暑錄話》：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為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為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蓋自謂深

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為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為餛飩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餛飩，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為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餛飩乃許甜。」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⁶

這則記筆記中，如果說西余淨端的回應有一絲幽默感，那麼這裡的幽默是建立在其僧人身份與其吃了肉包子之間的不協調性。但對很多熟悉佛教義理的讀者而言，這則筆記或許並非為了調笑，而是葉夢得關於戒律觀的嚴肅的思考。與前一則例子中的郡守不同，葉夢得這裡對於僧人破戒吃肉的態度是開放和思辨的。他不僅反對嚴格死板的理解戒律條文，而且也質疑蘇轍的唯心主義的破戒觀念（取決於是否心動）。葉夢得通過淨端的例子，引出他所推崇的建立在一種「不執著」的態度上的戒律觀。

葉夢得對於戒律的開放態度雖然不代表宋代的主流意見，但卻並非獨樹一幟。這是 11 世紀士大夫對禪興趣高漲的表現。從筆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從神宗熙寧（1066-1077）年間開始了「談禪」熱潮。在這波熱潮中，對於什麼是僧，什麼是士的討論挑戰了那些固化的觀念，同時也讓士大夫與僧人的界限進入更多士人的思考。很多當時士人會有在信仰問題上弱化身份區別的傾向。例如，司馬光據說曾評論到：「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⁷

6. 葉夢得《避暑錄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十冊，第294頁。

7. 佚名《道山清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冊，第110頁。

8. 葉夢得《石林詩話》，《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5-426頁。其中引述蘇軾的詩句來自蘇軾〈贈詩僧道通〉，全詩見《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93-4頁。

9.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頁。

三、吃肉與僧人的詩歌

在這股談禪的風潮中，作為士大夫文化中最為核心的詩歌創作，士與僧的身份又是如何被討論的呢？這裡吃肉的戒律再次成為一個重要話題。僧人的素食也被當成一個嘲笑僧人詩歌寫作行為的「話頭」或者「梗」。下面一則詩話，作者同樣是葉夢得，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餛飩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願解蔬筍語否？無為酸餛飩氣也。」聞者無不皆笑。⁸

這裡所謂的「酸餛飩氣」來自于菜包子里素菜餛飩因為發酵作用而產生的酸味。這個詞成為了士大夫談資中關於僧人身份的一個象征性標籤。我們之前在西余淨端的例子中也曾看到，這裡「酸餛飩氣」的「酸」也暗含了「什麼東西變質了」的含義。作為一個描述僧人詩歌創作的典故，「酸餛飩氣」多用於諷刺僧人詩歌有一種內在變質了的詩歌的感覺。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這則筆記中蘇軾的戲謔語氣。通過製造幽默的「笑」果，蘇軾的戲謔放大了他對僧詩格律凡俗的批判和嘲諷力度。這恰恰是詩話作為從宋代開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在輕鬆的筆調中間，不妨蘊藏著重要的理論；在嚴正的批評之下，卻多少又帶些詼諧的成分」⁹，這一體裁的重要特點和魅力所在。

與僧人的吃素相對應的，僧人的破戒吃肉也成為士大夫評論僧人詩作的一個常用典故。而且，不僅僅是名僧大德，連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僧人也逃不脫文人的調笑。這裡舉一則來自惠洪《冷齋夜話》的筆記為例：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

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食蒸豚，操筆立成，曰：「嘴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訥，夜話及此，為記之。¹⁰

這則筆記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其建立在王鐸（？—884）一連串像相聲中「抖包袱」一樣的漸進式對話。這些出乎意料之處恰恰在於它們打破了世俗對於僧人身份的固有認知。第一層出乎意料的是王鐸發現這個小寺廟的主僧竟然喝的大醉，表示他肯定破了酒戒。接著第二層出乎意料的是，這個主僧給王鐸吃的竟然是豬頭肉，而且告訴他寺里沒有素食。最後一層出乎意料，或許也是最讓士大夫讀者產生興趣的，在於這個僧人自稱能寫詩。將僧人寫詩與破酒戒和吃肉並列作為僧人的特別之「技」揭示了一些暗藏在輕鬆調笑之下的有趣的觀念。

首先，雖然沒有所謂關於寫詩的戒律，寫詩與吃肉喝酒一樣象征著對於僧人身份的突破。第二，寫詩同時代表著僧人對於自我身份的超越，將喝酒吃肉的破戒行為拔高到一種超越世俗固有認知的新的對佛教身份的認識。當然，我們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拔高是一種迎合士大夫價值觀的結果，這一點我們從主僧的詩的內容中也可略見痕跡。這首詩包含的一個隱喻是這位不知名的僧人在將自己被埋沒在山中的價值自比為美味的山中豬肉，他想傳達的信息是，比起京城里那些高僧，他其實更勝一籌。簡言之，這首詩其實可以看作是這位無名僧人的自薦信。最終他也得償所願，被賜予紫衣師號。當然我們知道，唐末的紫衣師號並不被人所尊敬，恰恰就是因為它們是僧人過於擁抱政治權利的象征。

10. 惠洪《冷齋夜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九冊，第39頁。

四、結語

這些北宋筆記中的有趣片段向我們揭示，僧人的言辭和文學才能往往被那些有悖於僧人身份的行為相聯繫。換言之，在宋代的調笑戲謔中，似乎一個僧人需要能做到「不是僧人」才會被認為是一個合格的「文人」。與此同時，世俗士大夫卻在與僧人的更密切的文學交流活動中越來越被佛法所吸引，他們在意識，觀念以至信仰上卻變得越來越「居士化」。